

说上声

李方桂先生(1980)有篇文章讲声母和声调之间的关系，里面提到汉语声调史里两个不大好解释的现象：(1)官话方言里，次浊在古平声跟着浊音声母走，在古上声却跟清音声母走。例如全浊和次浊的平声变成阳平，全清和次清的平声变成阴平；但全浊的上声变成去声，次浊的上声不变。(2)邵雍的<皇极经世书>把次浊分为两类，上声的归入清类，其他三声归入浊类。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讨论上声来源和唐代四声调值的文章(Mei Tsu-lin 1970)，其中一项结论认为唐代上声是高平短调，对于上声的调型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但对上声高调之说，一直深信无疑。*最近读李先生的文章，想到唐代上声高调和邵雍书里的现象有关，和<中原音韵>所常说的“上声起音”或许也有关。现在把一些初步的看法写下来，给太老师祝寿。

1. 有两种资料可以说明唐代八，九世纪上声是高调。元刻本<玉篇>神洪引唐<元和韵谱>(806-827)：

平声者哀而安，上声者厉而举，去声者清而远，入声者直而促。

另一种是安然作于880年的<悉昙藏>(大正新修大藏经)，卷八四，414)：

我日本国元传二音，表则平声直低，有轻有重，上声直昂，有轻无重，去声稍引，无轻无重，入声径止，无内无外。平中怒声与重无别，上中重音与去不分。金则声势低昂与表不殊，但以上声之重稍似相合平声轻重，始重终轻，呼之为异，唇舌之间亦有差升(下略)。

“平声直低……上声直昂”是说平声低调，上声高调。*文中又说“上声直昂，有轻无重。……上中重音与去不分”，这是指浊上变去，从这项音变可以推断上声和去声的相对调值：清上的调值比浊上高，浊上和去声调值相似，所以这两个声调合并；现在上声中全浊的这一部分并给去声，剩下的清上比去声调值高。上面已经看到平声是低调，所以上声是平，上，去三声中调值最高的。

再谈浊上变去。显示这音变的资料有慧琳<一切经音义>(788-810)，白居易<琵琶行>(815)，韩愈在元和(806-821)中作的<讳辩>，这都是前人提过的(周法高1968: 167; 王力1957: 21和191; 周祖谟1966: 495-496)。由此可知：(1)浊上变去至晚在八世纪末已经发生。(2)长安音是浊上变去的方音之一；慧琳是疏勒国人，工作地点在长安大兴善寺(周法高1968: 159)，最足以证明这项结论；白居易和韩愈籍贯不同，但长安话既是唐代的标准语，我们猜想他们诗文里反映的也是长安音。

现代官话方言浊上变去不包括次浊，官话的祖语在唐代也是这样。周法高(1968: 165-167)从慧琳<一切经音义>里引了四五十个浊上变去的例证，有些<广韵>的全浊上声字慧琳反切下字兼用上声和去声；有些全浊去声字，慧琳反切下字用上声；有些全浊上声字，慧琳在反切下面加“去声”。四五十个例子都是全浊上声，没有一个是次浊上声。上面引的白居易，韩愈的作品也是这样，但牵涉到的例子较少。

<元和韵谱>和上面引的安然<悉昙藏>这两项资料所描写的调值是浊上变去以后的声调系统，那时上声字只有次浊声母和清音声母，上声是高调。下面就要用次浊上声是高调这项结论来解释邵雍书里的现象。

2. 据<宋史>(卷四二七)的记载，邵雍(1011-1077)祖籍范阳，三十岁搬到河南，以后一直在洛阳讲学，周祖谟(1966: 582)指出邵雍代表北宋的洛阳话，是很有道理的。

他的<皇极经世书>附有“正音图解”，周祖谟(1966: 585)说，“盖宋蔡季通辈所为由博反约者也”。一共十二音，例如：

六音	清：东丹帝	七音：	清：乃奶女
	浊：兑大弟		浊：内南年
	清：土贪天		清：老冷吕
	浊：同覃田		浊：鹿##离

六音是舌尖塞音声母端，透，定，等韵图里的全浊依照平仄的差别重新分配，仄声的全浊配全清，平声的全浊配次清。七音是次浊中的来母和泥母，上声算作清类，平去入算作浊类。其他牵涉到次浊的图表也是按照这个规律分配。周祖谟(1966: 586-590)和李荣(1956: 166-168)书上都有全部十二音的图表，这里不再重抄。

我们认为北宋洛阳话的上声调值最高，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清”，“浊”这两个名词往往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辅音声母在发音时声带是不是在颤动，也就是韵图上所说的“全浊”，“次浊”，“全清”，“次清”。一个是由声母清浊之别所形成的阴调和阳调；现在还保留清浊声母之别的方言里，阴调总是比阳调高。在邵雍时代，浊音声母还没有清化，这两对差别总是同时出现，不容易分解，因此邵雍就把高调的次浊上声和清音声母归成一类，把非高调的次浊平，去，入三声和浊音声母归成一类。

前人对邵雍书里的现象的看法如次。周祖谟(1966: 593)说：

若乃明母之分为清浊两类，正与疑母相似。其清声均为上声字，浊声则兼括平去入三声，浊声古读，固无疑义，而清声之音，盖浊音成分校较少，或因声调之关系，读如西北音之mb。今日之河南音，“母”，“马”，“美”，“米”仍与明母无异。

李荣(1956: 171)说：

在邵康节的时候，鼻音字，边音字的读法一定依上声或非上声而有所不同。吴语黄岩，温岭的鼻音字，边音字平，去，入三声字带浊流，上声字声门紧闭，不带浊流，可以引为旁证。

陆志韦(1946: 79)说：

图里好像作为阴调的字，“五瓦仰，母马美米，乃奶女，老冷吕，耳”全都是上声字，……相配的所谓阳调字没有一个是上声字。邵氏的辨音又未必正确，他的方言的上声应当是升调。他好像把整个字的声调的上升跟辅音的阴阳弄糊涂了。

陆先生和我们的看法最相近，但他认为上声是升调，我们认为上声的高调的征性是解释这现象的关键。

李荣认为邵雍把上声的次浊字归入清类，是因为上声的次浊字声门紧闭，跟现代吴语的黄岩，温岭方言一样。李氏的意见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认为黄岩，温岭上声字韵尾带着喉塞音，以致上声字声门紧闭。用第一种解释来看邵雍，跟我们的看法相同，无需辨正，下面只是针对第二种解释。

以前为了证明早期上古汉语的上声有喉塞尾音-，我所引征的一条证据是：吴语的温州，闽语的浦城和建阳，海南岛的定安，这几个方言上声字还保存喉塞尾音，同时我也说，中古上声的短高调，是上古上声喉塞尾音失落后遗留下的痕迹(Mei 1970: 88-89)。温岭，黄岩和温州相距不远，可能有人因此认为是同一类现象。但这种方言现象只能帮助我们推测早期上古汉语上声的性质，不能和十一世纪邵雍的洛阳话相提并论。要如此论证，似乎必需假设上古或中古上声的喉塞尾音，保存于温岭等方言，也保存于十一世纪的；洛阳话，这假设的后一半还有商榷余地。

蒲立本(Pulleyblank 1978)差不多就是这样看法。他认为上古音上声有喉塞尾音，中古音一直到晚唐上声还保存这特征。

假如蒲氏的假设可以成立，那么从上古到唐末，汉语一直至少有四种辅音韵尾：入声的-p, -t, -k以及上声的-。喉塞尾音和音根塞尾音-k音值相近，在韵文中应该有互相押韵的现象。

实际上，入声-k尾字和上声字是否押韵呢？两汉的韵文罗常培，周祖谟研究过(罗，周1958)，魏晋的韵文丁邦新研究过(Ting 1975)，我们去查这两部书，根本找不着上入协韵的现象，丁书魏晋平上去入相押表(229页)如下：

	平声	上声	去声	入声
平声		15	16	
上声			30	
去声				86

此外两汉和魏晋的韵文中，各别韵部有去入相押(罗，周1958：80-104；Ting见上)，各别方言偶而也有-p, -t, -k韵尾混合相押的现象(罗，周1958：62-64；Ting1975：224)，在这种情形下，上声字不和入声-k尾字相押，是北方方言里上声在汉代以后没有喉塞尾音的有力的证据。个别在东南沿海地带的方言另当别论。

因此我们认为，喉塞尾音早期上古的上声很可能有，中古的上声几乎一定没有。至於邵雍书里的现象，单从理论的观点来看，用上声声门紧闭的假设可以解释，上声高调也可以解释，前一种解释的前提不能成立，所以我们采取后者。

邵雍(1011-1077)离安然<悉昙藏>(880)的时代不远。长安和洛阳是唐代的東西两京，长安缺粮的时候，整个朝廷搬到洛阳去就食(陈寅恪1971：97)，平时也是车轨交错，来往频繁，这两处的语音不会相差太远。此外我们知道至晚到九世纪末，李涪写成刊误<切韵>条的时候(895)，洛阳话也发生了浊上变去这个音变。这样看来，十一世纪洛阳的次浊上声高调是承继九世纪长安话的上声高调。

洛阳是北宋的文化中心，汴京(开封)是首都，两地相距不远，周祖谟(1966：582)已经证明了邵雍时代这两个方言韵类相同，他又说：“即是而推，则邵氏之书不仅为洛邑之方音

1.，亦即当时中州之恒言矣。”宋代似乎没有其他关于调值的资料，再往下推，就到了<中原音韵>(1324)的时代。

关于<中原音韵>的声调系统，杨联升(1969)指出三点：(1)<中原音韵>阳平的调值比阴平高，周德清在这书的“后序”和“正语作词起例”里屡次指出，唱高腔时该用阳平，不可用阴平。(2)<中原音韵>常说“上声起音”，可见上声是高调。*(3)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安徽淮北一带有不少方言阳平比阴平高，而且上声是高调，下面几个例子是按照杨先生所举的书目补充的：*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郑州	13	42	54	31
济南	213	42	55	21
石家庄	23	53	55	31
徐州	313	53	35	51

<中原音韵>的音系基础一直有大都(北平)和中州(河南一带)两说，杨先生认为，根据调值的标准，<中原音韵>的方言基础是中州，我们完全同意他的看法。为行文方便，下面管冀南，鲁西，豫东，淮北那一带叫“中原”。

杨先生的文章使我们看到调值系统的保守性，<中原音韵>离现在有六百多年，中原方言依然保持旧有调值系统的轮廓。郑锦全(Cheng 1973: 103)从另一个角度着手，也得到类似的结论。他收集了目前所能看到的方言调值资料，一共737处，其中347处是北方官话，202处是西南官话，然后分别统计四声中每一声的平均调值，结果是：

平声：2.53 上声：3.25 去声：2.91 入声：3.03

平声平均调值最低，上声最高，跟安然<悉昙藏>所说的一样。看来唐代官话的祖语的调值系统，现代官话方言大致还能保存。

回到正题，再看西安，洛阳，开封的现代调值。*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西安	21	24	53	45
洛阳	44	42	45	312
开封	24	54	55	31

三处上声都是高调，而且洛阳和开封上声调值最高。

现在沿着陇海铁路，从西往东，看看一路城镇的调值。

阴 阳 上 去 阴 阳 上 去

西安	21	24	453	45	洛阳	44	42	45	312
临潼	31	15	353	45	郑州	13	42	54	31
渭南	453	15	353	45	开封	24	54	55	31
潼关	42	25	451	45	民权	34	43	55	21
灵宝	21	314	55	434	徐州	313	43	55	51
##池	24	31	55	312					

从西安到洛阳，上面的资料有两个来源，在陕西境内，从西安到潼关，是白涤州的遗著<关中方音调查报告>，这原来是浪波计上所表现的曲线，再改成声调字母，这项资料记声调的方法特殊，我们不敢用来作任何结论。灵宝和##池是根据<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6本109页，和上列其他河南方言的来源相同。

很明显的，从西安到徐州，一路都有上声高调的方言，一到开封和洛阳，已经到了宋代中州地区的中心。这样看来，邵雍十一世纪洛阳话的上声高调和<中原音韵>(1324)的“上声起音”是一个来源。

2. 本文的结论是：

- (1) 根据文献资料，可知上声高调最晚出现于九世纪的长安话，十一世纪的洛阳话和开封话，十四世纪的中原方言。
- (2) 这些方言的上声现在还是高调。
- (3) 所以上声高调在这些方言里至少有六百年的历史；西安话保持了一千多年，洛阳话至少保持了九百年。

这个结论和目前流行的看法不同。不少做过汉语方言调查的都说，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调值就变得很厉害，把空间折成时间，在历史上调值想来也经过剧烈的变化，再进一步就说，拟构早期调值简直不可能。

上声高调是个显明的反面证据。中原地区上声高调的方言要找四五十处不成问题，*本文限于篇幅，只引了陇海路沿线的几处以及四个有代表性的中原方言，根据这些资料，用比较拟构的方法，上声早期的调值当然是高调，要知道所拟构的高调的年代，只好参考历史文献，结论和上面所说的相同。

为什么上面所讨论的方言调值特别保守？我们想到两个原因。(1) 这些都是官话方言，浊上变去，平分阴阳，去声不分阴阳，从安然的<悉昙藏>看来，这些方言的调类型态在八，九世纪已经形成。(2) 长安，洛阳，开封是唐宋时代的首都，又是文化中心。首都的方言是全国的标准语，影响力极大，四周的方言都向他看齐，变得一致。等到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他处，洛阳，开封丧失旧有地位的时候，以前受过影响的临近方言调值还相当一致，互相支持，所以这一带的方言能长久维持旧有的调值。从北平到沈阳一路四声调值都和北平话差不多，*是现代方言的一个例子。

这里该指出，就声调史来看，北平的调值在官话方言中自成一系。北平是金元时代新兴的都市，现代北平话阴平比阳平高，上声低调，最早描写北平话调值的文献是十六世纪<老乞大朴通事谚解>里的“凡例”(Mei 1977)，那时北平话已经是阴平比阳平高，上声低调。据此推论，北平话的调值系统恐怕在<中原音韵>时代已经和中原方言分了家。而且北平居北，唐宋时代洛阳，开封过来的调值影响鞭长莫及，北平变成首都以后，调值影响也还没达到洛阳，开封地区。

探讨调值系统的演变规律，我们还在学着爬的阶段，稍微难一点的问题就束手无策。洛阳，开封等方言的声调史是最好的练习题；这些方言调类简单，调值保守性强，文献资料又多，等到我们对几处的早期调值系统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去推测这些地方以及临近地区各个方言调值演变的规律。*

1. 丁邦新(1975: 10-12) 认为唐代的上声是高升调, 和我们的看法相近。Pulleyblank(1978) 也讨论过唐代四声的调值, 请参看。
2. 我以前(Mei 1970: 101-104) 讨论过上引<悉昙藏>文句的意义, 这里不再重复。
3. 王力(1962: 787(54.1节) 也说: “照我们的猜想, 在元代的北方口语里, 阴平是一个中平调, 阳平是个中升调, 上声是一个高平调, (<中原音韵>常说“上声起音”, “起音” 就是转高音。) 去声是个低降调。”<中原音韵>用“上声起音” 这个语词, 是在讨论某个曲牌某句某字应该用哪个声调的字。例如<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版第一集244页<满庭芳>: “...谁感慨兰亭古纸? 自吟桃扇新词.....”这是别人作的曲, 引来作为模范, 下面周德清按的评语说: “妙在‘纸’ 字上声起音。”“上声起音” 又见于<醉高歌>(245页), <骂玉郎>(245页), <折桂令>(252页) 等条下。
4. 郑州: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六本(1959), 109页; 济南: <汉语方言词汇>(北京, 1964), 4页; 石家庄: <河北方言概况>(天津, 1961), 64页; 徐州: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南京, 1960), 2页。
5. 西安: <汉语方言词汇>, 5页(这里引的西安调值和下一段引的略为不同, 因为资料来源不同)。洛阳和开封: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六本, 109页。
6.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六本, 109页(<河南各地方音与北京语音调值比较表>); <河北方言概况>, 64-67页;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二本(1958)30-32页(<鲁西南声调与北京话声调的对应情况>);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七本(1959), 42-50页(<淮北方音>)。
7. <河北方言概况>, 64-67页;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七本, 14-18页(“辽宁(九个地区) 与北京声调对应关系”)。
8. 本文初稿承郑锦全, 桥本万太郎, 丁邦新提出修改意见, 谨志谢忱。

参考文献

中文以威妥玛拼音, 英文字母为序:

安然 880: <悉昙藏>, <大正新修大藏经>, 卷八四。

陈寅恪 1971: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71), 此书原刊于1944年。

Cheng, Chin-ch'uan. 1973: A quantitative study of Chinese tone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 (1973). 93-110.

<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南京, 1960)。

周法高 1968: <玄应反切考>, <中国语言学论文集>(香港, 1968), 153-179。原载于<史语所集刊>20(1948), 359-444。

周祖谟 1966: <问学集>(北京, 1966), <关于唐代方言中四声读法的一些资料>494-500; <宋代汴洛语音考>581-655。

周德清 1324: <中原音韵>,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一集(北京, 1959)。

<方言与普通话集刊>第二本, 第六本, 第七本(北京, 1958-1959)。

<汉语方言词汇>(北京, 1964)。

<河北方言概要>(天津, 1961)。

Li, Fang-kuei. 1980: Laryngeal features and tone development, <史语所集刊>51.1(1980), 1-13。

李荣 1956: <切韵音系>(北京, 1956新一版)。

罗常培, 周祖谟 1958: <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第一分册)(北京, 1958)。

陆志韦 1946: <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 <燕京学报>31(1946), 71-80。

Mei, Tsu-Lin 1970: Tones and prosody in Middle Chine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Rising Tone, HJAS 30 (1970). 86. 110. 黄宣范译作<中古汉语的声调和上声的起源>, <幼狮月刊>40. 6(1974), 69-76; 又载于幼狮月刊社编<中国语言学论集>(台北, 1977)175-197。

----1977: Tones and tone sandhi in 16th centur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2(1977). 237-260.

白涤洲 1954: <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北京, 1954)。

Pulleyblank, E.G. 1978: The nature of the Middle Chinese tones and their development to Early Mandarin,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6.2 (1978). 173-203.

邵雍 <皇极经世>, 参看李荣1956和周祖谟1966。

丁邦新 1975: <平仄新考>, <史语所集刊>47.1(1975), 1-15。

Ting, Pang-hsin 1975: Chinese Phonology of the Wei-Chin Period (Taipei, 1975).

王力 1962: <汉语诗律学>(北京, 1962新一版)。

杨联升 1969: <中国语文##记>, <史语所集刊>(庆祝李方桂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 39.1(1969), 205-215。

On the Rising Ton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Rising Tone was a high tone in the dialect of 9th century Ch'ang-an, 11th century Lo-yang, and 14th century Chung-yan ("Central Plain") area because (1) Annen's His-t'ang tsang (880) says that in the Ch'ang-an dialect "the Level Tone is level and low, ... and the Rising Tone is level and high", (2) Shao Yung's (1011-1077) Huang-chi ching-shih marks sonorant initials in the Rising Tone as "clear", and those in the other three tones as "muddy", and (3) Chou Te-ch'ing Chung-yan yin-yn (1324) often uses the phrase "shift to a high pitch with the Rising Tone" ("shang-sheng ch'i yin").

The Rising Tone is still a high tone in present-day Ch'ang-an, Lo-yang, K'ai-feng as well as in many localities in the "Central Plain" area- an area encompassing southern Hopei, northern Honan, western Shantung, and Anhwei north of the Huai River.

The remarkable persistence of the tonal value of the Rising Tone at these localitie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Ch'ang-an, Lo-yang, and K'ai-feng were the capitals of the Tang and the Sung, and that the prestige dialect of the capital spread to the neighboring towns, thus forming a mutually supporting network of conservative dialects. The fact that their tonal systems all inherited the same splits and mergers from the 9th century Proto-Mandarin tonal system is thought to be a contributing factor.